

山不转人转

——云南昭通脱贫攻坚口述

口述人：杨亚林，1964年出生。2017年3月至2021年3月，任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常绍慧，女，1964年出生。曾任昭通市大关县图书馆馆长。2015年12月至2021年5月，作为扶贫工作队员，前往大关县玉碗镇玉碗村、天星镇中心村开展扶贫工作。

董文渊，1962年出生。现任西南林业大学二级教授。1993年至1995年，任大关县人民政府科技副县长。长期在云南从事珍稀濒危筇竹研究和科技推广工作，迄今已达31年，获云南省脱贫攻坚奖。

访谈组：李志明 黄 珊 王榮成 赵心慧 吴 忱 毕林丰

日期：2024年9月23—26日、2024年12月1日

地点：云南省昭通市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翠华镇辕门街14号中共大关县委员会三楼会议室

这里的水土不养人

杨亚林：我是2017年3月到昭通任市委书记的。大家都知道，2014年8月3日，6.5级地震突袭昭通鲁甸，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6.5级的地震好像也不算太大，为什么昭通会有这么多人罹难？外面的人只有到了昭通，才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这里贫困面积大、基础条件差，当时大量老百姓家的房子是用石头堆砌的，一晃动就会倒塌，人就会被埋在石头里。第二个原因是，这边的山全部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地震后，石头滑坡、滚落，好多村子就被石头掩埋了。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来昭通看望时就提出了明确要求：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抓好脱贫攻坚，确保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确保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句话，这是指导，更是命令。我到任后就一边调研，一边思考：昭通最大的市情是什么，根子上的问题又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到昭阳区的大山包上的一个村子调研。我之前长期工作生活在普洱，普洱是亚热带雨林气候，温暖湿润，与昭通的高寒天气差别太大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高寒地区的冷！去调研的时间是6月份一天的中午一两点钟，整座山上寒风凛冽、云雾缭绕，10米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村里老百姓住在破旧的土茅草房里，房顶上还长着草。他们在家里裹着破棉被，烧着火塘，用三脚架支一口锅煮土豆，全家人都围着火塘坐在那里。夏天中午都是这种状况，冬天会怎样办？我们不用想都知道。当时我就心想，这样不行啊，这种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谈发展。

后来，我又到巧家县东坪镇的道角村调研，印象也很深刻。这个村背靠着药山，药山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庄的海拔有三千多米，常年云雾茫茫的，见不到阳光，湿度非常大，是典型的偏远、高寒的深度贫困村。全村最多时有497户人家，但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落后，有419户自发地迁出去了。我去调研时，全村只剩下78户280多人。走访调研后，我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村子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二是村子山高坡陡，能种植的作物只有土豆和荞麦，生活条件太艰苦了。老百姓这样不是在生活，只能叫活着、熬着。

所以我就认识到，我们昭通脱贫攻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这是最大的市情，也是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昭通地处乌蒙山腹地，高寒凉凉，2.3万平方公里，96%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承载着630万人口，其中185万是贫困人口，11个县（市、区）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公认的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

怎么办？我们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一个认识，昭通发展要“破局”，关键在抓住脱贫攻坚和城镇化的双重机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大规模地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生产方式。“扶到根上”，就是要挖掉穷根，把贫困百姓搬出大山。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搬不动山，咱就搬人。只有彻底搬出大山，才能彻底告别贫困。

盘清贫困家底

杨亚林：事非经过不知难，最难的是开

头。我刚到任的时候，昭通全市贫困人口185万人中还有113.37万人未脱贫，按照国家要求的脱贫时间倒排，平均每天必须脱贫1000人以上，这个任务量太大！当时，不少干部缺乏干劲，一些百姓信心不足，都觉得这么重的任务，无法完成。

当时，中央强调精准扶贫，但我们在工作中却总是不断发现底数不清、数据打架、群众认可度不高的问题。我到昭通工作后不久，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来调研，我们坐在车上，我如实告诉他：“总感觉我们精准扶贫的第一粒扣子没有扣好。现在前任书记刚被提拔走，我立刻处理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妥。”话音刚落，部长就大声说：“杨亚林，你要记住，你之前是他全权负责，但现在的事情都归你负责了，别犹豫啊！”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此后，我就放下了思想包袱，下决心从头再来，从扣好第一粒扣子开始。

于是，我们就在昭通市委党校的阶梯教室开了一个动员会。那时候昭通的条件差，连开大会的地方都没有，开人代会的礼堂都是用党校体育馆的阶梯教室。篮球场两边坐人，干部在中间讲。就在那个阶梯教室，我给大家讲了精准识别的三句话要：第一句，从头再来但不是推倒重来。对外宣传，不全盘否定之前认定的贫困对象，避免误导和产生混乱，但对内要求严格对照新标准和要求，重新进行调查和评定，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如果没有从头再来，第一粒扣子就歪了，后面很难取得成功。第二句话，全面调查，全面起底。把全市所有农村户籍人口都作为调查对象全面开展调查，掌握所有农户的基本信息，让群众充分参与和认可，体现公正公平。第三句话，稳中求进，确保质量。严格进行动态管理，全面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严格程序和标准，稳步推进。

第一步，把贫困户精准识别出来。我们选派了3447支工作队、2.36万名工作队员到基层，以农村的最小单元——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重新评定贫困户。你们也都知道，农村是熟人社会，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可以清楚掌握村民的实际情况。一个村子平均居住50户左右的百姓，就派一个工作组扎在那里，深入实地，详细梳理村民的实际情况，允许他们参评和质疑，等他们都认可后再公示。

实话实说，很多干部说，多年以来昭通的人口就没有普查清楚过。同时，当时农村低保中错保和骗保的情况比较多，不仅给国家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也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通过这次清查，发现了很多没上户口的人。你们猜多出来多少人？24万！当时我也吓了一跳，这相当于多出了一个县的人口啊。为什么会多这么多？主要原因就是超生，上不了户口。昭通有很多人没有户口，这就是现实。于是，我们就实事求是，给这24万人上了户口，办了身份证，让他们能够正常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同步查清纠正了农村存在的10.96万人低保不规范问题。因此，“精准识别”和“回头看”之后，我们将家底盘清楚，弄清楚了昭通的总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数量，逐步规范了应该规范的事情，真正扣好第一粒纽扣。做这项工作要走村入户，我们有很多扶贫工作队，他们到村民家里去，做了非常细致的群众工作，花了不少功夫。你们可以请一位扶贫工作队的同志来讲讲。

常绍慧：要精准识别贫困户，得先让村民配合。我在图书馆工作30多年，天天和书打交道，并不太了解社会，以前没有参加过扶贫工

作。2015年12月，我和其他4名文化系统的干部（周元江、石磊、祁德胜、高翔），被县委、县政府派到玉碗镇玉碗村何家坡村民小组挂钩帮扶，开展扶贫工作。这个小村子在一个高山上，海拔1500米，不通公路。我们第一次去何家坡时，就看到了有的房子是土坯房，有的是草房，又低又矮，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倒塌。村民不仅物资匮乏，精神文化生活也很滞后，有些村民周末会去昭阳区的五寨做礼拜，这是一种地下传教，不是正规的。甚至村里还有不少封建迷信活动，比如“竖筷子”，有人生病了，就盛半碗水，用三根筷子，一头沾上水，竖在碗里，叫亡人的名字，叫到谁的名字，筷子竖起了，就认为被这个亡魂附体了。只要烧些纸钱给这个亡人，生病的人不吃药就能好。生病后不吃药，寄希望于迷信来治病，实在令人震惊，必须下大力气拔掉村民们的穷根。

我们工作队刚去何家坡村民小组的时候，发现村民表情木讷，根本不搭理我们，对我们开展的工作一点也不配合，找村民开会，也没人想参加。我们驻村工作队一连去了4次，每次不是吃“闭门羹”，就是遭受“冷遇”。从来没有村民会挽留我们再坐坐，即便遇上村民杀过年猪，连一句“吃完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我记得有一次去何家坡是在5月底，感觉村民仍然和我们“保持距离”，你说什么他都爱搭不理的。面对这样的尴尬，我想：“该怎么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啊？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打开群众的心，精准帮扶才能进行，精准脱贫才有可能。”我就和同事们商量，快过儿童节了，咱们下次来何家坡，用背篋背点书和文具、糖果，给孩子们过个儿童节。我的建议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于是我们5个人自费凑了2000元，买了一堆书包、文具、饼干和糖果，还特意买了毛巾、香皂带上。6月初的一天，一切准备妥当，我们5个人装起物资，乘车到公路尽头，剩下的山路就每人背着一背篋物资攀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何家坡。村民们看到我们背着东西满头大汗地赶来，觉得我们是真的来帮扶了，村民小组组长张银波就带着一些村民跑出来帮着背东西。

这个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下面一家的房顶是上面一家的坝子。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张银波家前的平房顶上，给孩子们补过了一个儿童节。先是把礼物发放给学生和村民。发完后，我们将带来的书摆在背篋上，请大家来看。现场的孩子很多，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其实很喜欢这些书，但是都不好意思，只是羞涩地站在旁边看着。我便邀请他们过来一起谈，告诉孩子们，这些书是送给你们的。他们过来后，识字的孩子翻翻这本，看看那本，遇到喜欢的书就拿过来看，不识字的孩子就拿起画报看，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些书好看，就两个孩子一起看。阅读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在房顶上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舞欢迎和感谢我们。

办这个活动时，村里就张罗着做饭。之前村民们从来没有邀请我们去家里坐一下，现在突然留我们吃饭，我们有点不太适应，就不吃了，要走了。他们说：“不行，如果你们走了，就是看不起我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就留下来吃了饭。村民煮了腊肉，炒了地里种的洋芋和其他蔬菜，一共有三个菜。我们吃完饭后告辞，村民们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每个人都面带笑容地挥手，把我们当成了亲人。这次“房顶上的儿童节”，是我们最欣慰的一件事情，终生难忘。从那以后，村里人对扶贫工作就比较配合了，

也愿意和我们说话了。后面进行入户调查，搞精准识别，一轮一轮地登记、筛选等等，他们都很积极。

喜从天降

杨亚林：大规模搬迁不是我们市里说定就能定的，这是大事。在前期决策的时候，省委、省政府集思广益，最后下了决心。

昭通的搬迁模式，与全省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并不是从这座山搬到那座山、从山顶搬到山腰或者山脚。这种在大山里搬来搬去的方法，解决不了昭通贫困的根源。我们要让老百姓从山区进城入镇、进厂上楼，配套产业就业，一步实现跨越。说实话，这种方式的成效最为显著，但过程也最为艰辛，风险巨大。

当时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搬迁用地从哪里来。昭通的地形地貌很特别，除昭阳、鲁甸所在的昭鲁坝子，其他9个县市都是山高坡陡的山区，甚至难以找到一块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平地。如果连一块平地都找不到，你让老百姓往哪里搬？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占用一些耕地。你们到靖安，看一看周围的地形，就能理解当时的用地困难了。这就是昭通的实际情況，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出路，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想征地，这个太难了。为了办成这件事情，我去省里找国土资源厅不少次，国土资源厅说这违反规定啊，他们领导刚开始就直接不见我。最后，被我缠得没办法了，他们就建议我削掉对面的山头，把山弄平，把安置房建在那里。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挺好，但这样不现实啊。因为拨给我们的资金有限，时间要求也紧。光是削山头就能把易地搬迁安置的所有资金用完，后面拿什么去建房、建配套设施、搬家？最后他们也没办法，让我们上报国土资源部。

当时，很多部委的干部都下沉到脱贫攻坚一线。我们正为搬迁用地一筹莫展时，正好来了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干部，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说，争取将这件事情提交到党组会议。没想到，刚过几天就接到喜讯，他们部党组会议支持这件事，还同意特批我们搬迁可以占用闲置土地。拿到了特批指标，这件事情才落了地。这就是“采取超常规举措”和“硬办法”！

易地搬迁政策出来之后，我们组织进行讨论：“搬多少？怎么搬？”最终，大家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坚决贯彻“能搬则搬、应搬尽搬、整村搬迁”的原则，把贫困山区的群众都搬出大山，摆脱穷根。

搬迁这个事情，并不是简单地缺房建房、缺水补水，而是需要统一规划和设计。实施大规模的进城搬迁，可行不可行？除了我们要系统谋划和配套外，更重要的是群众要接受和适应。为了积累经验，我们先在昭阳区做一个试验，当时正好还有一些保障性住房没有分配出去，我们就先组织了2000多老百姓搬下来，配套各项措施，帮助其适应和转变，用半年多时间做了个试验，全面收集百姓的需求、困难，并思考应对策略。实践表明，搬迁后的群众是满意的，通过努力是可行的。

我们搬迁前期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分指标下任务让各县区分头完成，首先是按照“让人搬到人该待能发展的地方，让树长到树该长的地方，重新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城乡人口分布格局重构、产业发展结构重组、山区自然生态环境重塑，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的要求，立足实际，立足客观条件和空间潜力，打破县、乡、村行政区划，坚持全市“一盘棋”，坚持整体谋划、统一选址、统一规划、同步配套，全面统筹空间、人口、产业三大结构，重新定位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打乱县域布局之后，之前所有的政策支撑、利益格局等全部被打散，所有事情重新组合，由市里操盘，明确哪个县的人能来，来了之后每个人能带来多少钱，国家政策补贴要拿过来多少，这些都是需要统计和计算的。在全盘考虑好之后，再告诉大家，什么人需要搬、怎么搬。国家给了我们云南一些搬迁指标，好多州市要不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最复杂、最艰难的事情。我们把全省没人要指标统统拿了过来，因此，我们才有这么大的搬迁规模。靖安、卯家湾跨县安置区，从选址、规划、建设到搬家用一年时间全面完成。2020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昭通召开全国发展改革系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充分肯定和推广昭通模式。

当时，各县的情况不太一样，昭阳区、鲁甸县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承担其他几个县的压力。

靖安原来是昭阳区下面的一个镇，因为在大关县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就计划把靖安划到了大关县，作为安置区。后续还计划把大关县城也搬到靖安来，打造出100万人口的一城三区。把靖安镇划给大关县，当地百姓刚开始都不愿意，还质疑你，为什么要把中心城区的地方划到大关县？我们就给群众解释，将来会把大关县城搬到靖安来，以后你们这里就是县城所在地，从乡镇到县城，你们提了一个格，各方面的配套设施都会好很多！他们一听，感觉不错，就同意了。对于搬到靖安的群众来说，更是举双手赞成，这里将来是中心城区，当然愿意过来了。有些事情，你给老百姓讲明白，他就支持你。

打通思想“堵点”

杨亚林：把整村的老百姓从山里搬到城里，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要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也是比较难的。有些群众，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都有很多的顾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贫困群众，“在惯的山坡不嫌陡”，担心怎么融入新环境、开启新生活，刚开始都不愿意搬。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彝良县角奎镇拖柳村老寨和新寨两个村民小组。这两个村子都在两千多米的高山上，不通车路，村民在山上条件极差，勉强维持生计。两个村子一共有60多户苗族群众，他们都不愿意搬。工作队员三番五次到寨子里做思想工作，还是做不通，新寨只有6户愿意，老寨只有3户愿意，大部分百姓始终都不同意。后来，我们又选派了一名精通苗语的干部，专门负责做苗族百姓的思想工作，才了解到，苗族百姓喜欢抱团群居，他们胆小，对搬迁宣传的政策有怀疑。于是，这名干部专门研究了苗族百姓喜欢读的书和苗族百姓中流传的故事，用其中的道理跟他们交流。经过3个多月的动员，大部分苗族群众的思想终于转变过来。后来，村主任带头搬，逐步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整个村子就都搬出来了。老百姓的工作就是这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出来的。

干部观念的扭转也不容易。当时不少干部对搬迁脱贫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不同县区推进这项工作的力度和效果也不相同。给你们讲一个现实的例子，我到靖安这里来选址、论证、做规划时，市里四套班子和各级领导都来了，现场摆放了三块展板，我给大家讲解为什么要在这里选址，讲搬迁、县城、中心城区组团“三部曲”的理念和规划布局。那天很冷，我还没讲到一半，很多干部都跑到中巴车上去避寒了。不少人就质疑：这里这么冷，房子建好也没有老百姓愿意过来！我记得当时镇雄的县委书记说了一句话：再冷也好过我们镇雄！

所以说，并不是方案一提出来就会被认可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曲折。干部最初不知道怎么干，也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承担风险并且严格执行的。但是，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也是有战斗力的。只要管理到位，一定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各级干部一五一十地抓落实，很快就动起来了。

常绍慧：我讲一个全力动员搬迁的故事，发生在悦乐镇新寨村的海坝村民小组。这个村民小组就是一个动迁难的代表。县里的领导曾多次上山亲自沟通，让他们从山里搬出来，但他们就是坚决不搬。所以县里就让我们工作队驻到那里，去做细致的动员工作。这个村民小组是我们县最偏远的一个自然村，从城区出发，要先开两个多小时的车，然后下车步行3个多小时才能到，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家，生存环境很差。

这个村子很穷，老百姓住的全部是那种用竹子交叉搭成的“杈杈房”，房子很低，人要弯腰才能进屋，晚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我们去了之后，劝他们搬出来。我们单位的一位苗族干部根据亲身经历给村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读书时，家里很穷，父亲把一只羊牵到集市卖了，去交我的学费，但一直等到天黑也没卖掉，非常着急。如果海坝村以后草也没有了，羊也养不活了，你们连羊都没得卖了。到那时候，子孙怎么办？在这里怎么生活？”他讲完后，村民们都很受触动，因为他们村当时的情况确实很艰难，山上的树都已经砍光了，只剩下一点草地，种苞谷基本不长没有收成，只能种洋芋和高山养子。如果不尽快搬走，以后的生活会更苦更难。但即便是这样，很多村民还是不想搬。

这个村民小组的组长叫王兴，我以前不认识他，但他跟我的侄子常礼洪熟悉，所以他见了我也感觉比较亲切。晚上一起吃饭时，我在火塘边跟他聊。（下转4版）